

# 40年跨越式发展 昂首迈向高教强省

□本报记者 汪恒

改革开放40年,浙江高等教育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初期的规范和整合,恢复高等教育秩序;到世纪之交抓住时代机遇,努力实现体量提升;再到时注重内涵建设,不断推进教育现代化。当前,高等教育强省战略全面实施,浙江高等教育站在了新时代的新起点上。

20世纪70年代末,浙江恢复高等学校招生文化考试制度。高等教育从此开始以发展为主旋律,探寻提升路径。多年来,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不断扩大,高校数量持续增长。随着社会经济繁荣发展,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规模的期盼越来越强烈。20世纪90年代末,浙江高等教育启动了跨越式发展的步伐。杭州的下沙、滨江、小和山高教园区和宁波、温州等地的高教园区等相继投入建设,大批高校陆续迁入。

高校办学条件大为改善,为规模扩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按新机制举办的高职学院和普通高校二级学院,以及民办高等教育的兴起,也为我省高等教育“扩容”提供了坚实保障。2001年,全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浙江正式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

规模发展加速了,内涵提升开始成为浙江高等教育发展的题中之义。2000年以来,我省陆续提出重中之重学科建设计划、一流学科建设工程、高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2011计划”)等,聚焦办学质量提升。如今,浙江省重点高校建设计划已确定两批共12所省重点建设高校。在“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中,全省有3所高校、20个学科入选。

1998年6月28日,浙江中医学院(现已更名为浙江中医药大学)在杭州滨江高教园区举行移址建校奠基仪式,拉开了我省高教园区建设的序幕。

入国学科数量居全国第五位。截至今年9月,浙江高校有53个学科进入ESI前1%排名,学科总数位居全国第七。

经过40年的发展,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功能更加凸显。近5年来,高校共从事企业单位获取横向科研经费122亿元,授权发明数量占到全省授权发明总量的1/4左右;浙江以占全省5%左右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产生了全省3/4左右的高水平创新成果。通过产学研合作,浙江高校和浙江社会发展关系更加紧密。

与此同时,高等教育越来越显出在人才引进和输出方面的优势。浙江高校吸引了大批两院院士、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省“千人计划”专家等任教讲学,浙江成为人才集聚的高地。每年,高校向社会输送30多万高素质人才,在全省人力资源建设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使浙江省人均受高等教育程度显著提高,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增长速度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大学生创业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高等教育在国际化建设上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我省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数和留学生占在校生比例在全国名列前茅。“留学浙江”正成为浙江高等教育的一张新名片。

从1978年全省仅有20所高校,到2018年的109所高校;从1998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8.96%到2017年的58.2%,并在全国23个省份中率先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浙江高等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这里曾走出了全国最早成立的全日制民办高校浙江树人学院、全国首家引进国外教育资源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国内首家由社会力量举办并由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西湖大学……

回溯往昔,浙江高等教育成绩丰硕。新的号角已然吹响,浙江高等教育定将在新的征程上一往直前。



►2013年5月,以设计制作“排除万难”机器人为主题的省第十届大学生机械设计竞赛在浙江工业大学举行,全省40多所高校700余名师生参赛。



►2015年7月,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典礼和学位授予仪式在该校紫金港校区举行。

►浙江海洋大学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学生在科考船上进行专业实习。



## 亲历者说

## 我与浙江高教的这些年

□宣勇

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40年也是浙江高等教育大发展的40年。从历史的视角,我以为可以把4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分为四个时期:首先是恢复与重建期(1978—1998),之后是外延发展与高速增长期(1999—2009)以及内涵发展与转型期(2010—2016),最后是能力提升与服务引领期(2017—)。我先后在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农林大学和浙江外国语学院三所高校学习、工作,作为得益于我国改革开放、得益于高等教育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特别有意义的是我的人生历程中的重要节点刚好都是踩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时代节拍,同频共振,相伴相随。

一、恢复与重建期(1978—1998)。1978年,13岁的我进入高中。恢复高考让我实现了“大学梦”。1980年,我成为浙江工学院(现为浙江工业大学)的首届学生。大学毕业后,我留校担任政治辅导员。20世纪90年代初,我担任学校化工系党总支书记,在学校率先探索政、产、学、研的办学模式,在学院内部进行“两院制”改革,成立化工研究院。

1998年,我调任学校党委组织部部长。针对当年浙江大学“四校合并”给浙江高等教育格局带来的重大影响,校党委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并着手进行校内管理体制变革,提出构建“学校—学院—学科”的管理新模式,通过学院多项自主权的下放来调动办学积极性,并实行教师的全员聘任,从身份管理转变成岗位管理。

二、外延发展与高速增长期(1999—2009)。2000年,我始任浙工大副校长。当时正处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初期,有两件事非常重要,一是后勤保障,二是校园基本建设。20世纪初高校后勤社会化快速推进,政府的重视解决了大众化进程中的“瓶颈”问题。然而,由于前期推进过快、后勤改革不彻底等,一些矛盾逐渐凸显。通过对体制机制的不断探索,浙工大的容大后勤集团不仅有力保障了学校大众化发展的需要,还承担了滨江高教园区的后勤设施建设与所在高校的后勤服务。

在校园建设方面,我认为,校园建筑的规划与设计首先应是学校教育理念与文化传统的完整表达,大学建筑与环境的功能应合乎学术活动的要求,功能区的分布要分合得当、动静结合,同时体现学术自由理

念。“兼容并包,和而不同”是大学的理念,亦是我对整个校园建设的设计理念。十年之中,浙工大的校园建设,包括之江学院、老校园的建设和改造,建设经费将近20亿元,新建建筑面积60余万平方米。

三、内涵发展与转型期(2010—2016)。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正式颁布,提出大学要避免同质化,要分层分类办出特色。高校要由外延转向内涵发展,注重办学质量。同年,我调任浙农林大担任党委书记。当时,浙农林大刚刚完成更名升格,正面临如何科学定位和谋划未来的现实问题。

我提出,大学内涵发展的第一个关键因素是学校定位与战略。我们发动全校教职员工积极思考学校的定位问题,并在校党代会上确定了学校的战略目标。

大学内涵发展的第二个关键因素是制度与变革。制度的变革首先是文化的重塑,我们提出了“学生为本、学者为要、学科为基、学术为重”的办学理念,并决定以“管理改革年”来集中全面推进改革工作。章程建设是学校进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和着力点。作为全省章程建设试点院校,浙农林大的章程建设在全省乃至全国高校章程建设过程中也发挥了示范作用。

大学内涵发展的第三个关键因素是人才与干部队伍建设。2011年,学校在中层干部换届上着手进行系统性改革,构建干部能上能下的选人用人长效机制。同时,把坚持以人为本,造就一支高水平的人才队伍,作为学校的一项重要工作。

大学内涵发展的第四个关键因素是合作与发展。开放性是现代大学重要的办学理念。学校积极探索开放办学的有效路径。这方面,有两件事是对学校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一是与国家林业局省部共建;二是独立学院迁建暨办学。

四、能力提升与服务引领期(2017—)。2016年,我来到了浙外。党的十九大召开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我们把对接“一带一路”、服务“开放强省”作为学校的重要使命。接下来,我们将努力把浙外建设成为浙江省“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点基地、服务开放强省的智囊高地、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阵地”,奉献“浙外能力和浙外贡献”。

(作者系浙江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 先锋人物

## 徐亚芬:冰心一片倾情教育改革

□本报记者 汪恒

在浙江高等教育近20年的发展历程中,徐亚芬以执着的改革者和办学者的形象广为人知。省内的两所高校,浙江万里学院和宁波诺丁汉大学都由她主导创立。徐亚芬在高等教育多元化办学模式上的探索历程,也成为改革开放精神的生动写照。

1993年,徐亚芬和她的同事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全民事业制教育集团——浙江省万里教育集团。1998年,万里教育集团接手了浙江农村技术师范专科学校,开始探索新的运行模式和机制。当时,浙江农技师专的办学条件很不理想。“接手这样一所高校,要比新建一所难得多。”有人这样告诉徐亚芬。但徐亚芬坚持认为,“国内高等教育的毛入学只有8%左右,社会上还有92%的学生无法接受高等教育。如果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就会给更多的家庭带来希望”。

1999年,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复同意浙江农技师专改制,筹建浙江万里学院,由万里教育集团举办,国有性质不变。这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将政府办的大学交给一个民办教育集团承办。筹建的过程是艰苦的。除了硬件改进,还有更棘手的师资问题。

半年时间里,浙江万里学院作为全国第一所整体改制的普通高校办起来了。徐亚芬希望新学校能破除当时高校管理的一些弊端。浙江万里学院顺应现代大学制度的内在要求,在举办者、管理者和办学之间实行三权分离,即管理者(浙江省人民政府)、举办者(浙江省万里教育集团)、办学(浙江万里学院)三者权责分明、有机制衡、良性联动,形成合力。此举改变了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计划经济管理机制。

万里教育集团从宏观层面对浙江万里学院的管理机制进行设计,提出学校“去行政化”,并具体分管学校教学以外的所有事务,如基建、

后勤、资金投入等。同时,采取“职业校长”模式,将校长一职从职务型向专业型转变,即校长集中精力搞好学校的教学教育工作,实现“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浙江万里学院还被教育部定为实行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的试点高校。这套新的领导体制、运行体制和管理模式也被誉为“万里模式”。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合作组织。徐亚芬关注到,当时国内在培养了解国际运行规则的人才方面有很大的短板。她冒出了一个想法:把国外大学引到中国来,并且把目标锁定在世界排名前100名的大学。徐亚芬把这个想法说出去后,不少人都认为她在开玩笑。“这个比当年办万里学院还要难啊!”徐亚芬回应:“山不过来,我过去。”经过英国诺丁汉大学校监、宁波籍院士杨福家牵线,万里教育集团向综合实力排名世界前100名的英国诺丁汉大学发出邀请,表达了合作办学的意向。中外合办高校在当时没有先例,一切需要从开始。

2004年,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独立校园的中外合作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正式开学。学校采用小班化教学,讨论式、合作式学习,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自主学习及团队合作的能力,并通过富有国际化特色的社团活动拓宽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学生教育就像打桩,打桩的质量决定着建筑物是否牢固,而科研就像是建筑物上闪亮的明珠,因此,大学要以培养学生为根本,教学是最重要的。”徐亚芬说。宁波诺丁汉大学也为中国教育走向世界探索了一种全新的模式。

回首自己的教育之路,徐亚芬说,这辈子她做了两件事:一是创办了浙江万里学院,让更多学生圆了大学梦;二是把诺丁汉大学引进中国,让学生在境内享受国际一流大学教育,既守住了本土的价值体系,又拓展了国际视野。“改革就是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做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徐亚芬说。